

《国际中文教育前沿》第1辑
江苏求真译林出版社 2022.12, 第175-187页

“充值”的人生

——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个案研究

申 莉 王学松

摘要：语言、文化、价值观、个性特征等文化资本影响着拥有者的话语权和社会权力地位。本研究选取一位喀麦隆留学生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访谈、观察、实物收集法收集原始资料，运用类属分析法和情境分析法对其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表现出的中华文化认同进行分析，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剖析深层原因。研究发现，较高的跨文化敏感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助其积累中国语言文化资本；具有交换价值的英语资本助其换取中国语言文化资本；积极外向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助其快速融入旅居场域，获取中国语言文化资本优势。国际中文教育中应发挥场域优势、以中文教育为核心，充分挖掘学习者文化资本的超常价值，促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作者简介：申莉，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邮箱：shenli@bnu.edu.cn。王学松，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长与研究兴趣为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教育部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和机构评价研究及学术平台建设”重点项目阶段成果。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青年课题）“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中文国际教材中的融入研究”（项目批准号21YH42D）。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个案研究

1. 引言

二语学习者由于第二语言习得的便利，有了接触不同文化的机会，他们二语学习的过程也是文化认同的重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引起了诸多的关注。西方学者从学习者内部心理机制出发，认为对一种新的语言文化的认同不一定会失去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认同，提出了附加性双语（*additive bilingualism*）和削减性双语（*subtractive bilingualism*）（Lambert 1974）、融合型动机框架（Gardner 1972）、“社会距离”“心理距离”对二语适应模式的影响（Schumann 1986）、二语动机自我系统（Dornyei 2005）。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逐渐出现了二语认同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将社会学中的“投资”“想象共同体”等概念引入学习者认同研究（Norton 1995, 2003）。我国学者提出了文化认同的“生产性现象”，并引入二语习得中对“投资”的概念，关注英语学习者语言与文化认同的社会文化范式（高一虹 2001；芮晓松 2008）。

作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来华留学生的母语语言文化、个性特征，对他们在旅居场域中体制化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对汉语进行合理投资，其预期是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取得更大的收益，投资的过程伴随着对中国文化的跨文化认同。已有汉语学习者中华文化认同研究较多运用量化研究或者思辨研究的方法从宏观上研究学习者心理机制变化、社会环境的影响，思考教育策略（魏岩军等 2015；陈默 2017, 2018, 2020；申莉 2018, 2019, 2021），从微观上着眼于学习者中华文化认同建构的复杂过程、特征、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个案分析的方法，考察一位喀麦隆留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自我建构，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学习者的中华文化认同如何建构，中华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2. 中华文化认同与跨文化认同

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目的语文化对学习者的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衣食住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既源自母语文化，又不完全等同于母语文化；既融合了目的语文化认同，又与目的语文化不完全一样，是单一文化认同的升华。二语学习者在维持其母语文化主体性的

前提下，文化身份本体最大限度地开放，在语言学习中取“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在差异中建构共识，在协商和整合中实现超越，他们对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是一种跨文化认同。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不同于狭义的本土文化认同，是广义的文化认同，是指留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母语语言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融合，体现出留学生包容开放的心态和融汇不同文化视角的能力。来华留学生在旅居场域建构起的中华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语言文化、中国社会族群、中国价值观的认同，其建构不仅体现“赞同”，更多包含尊重和包容，是对自身与周围关系的思考。

Freud 最早从心理学视角对“认同 (identity)”做出了解释，认为认同的作用是把客体 (人或其行为) 内化，使之进入自我或自我的结构，使自我的结构改变 (Freud 1924: 434—436)。这个词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我国，较早出现在《辞海》中，释义是：认同 (英 identification)，一译“认定”。我国心理学界解释为“在社会情景中，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团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它是个体经社会学习或社会化之后，在心理上所产生的一种主观的归属感或归属意识” (张春兴 1992: 316—317)。在我国经过多年的词汇发展，“认同”已经在普遍意义上表示“承认与认可”。

“文化始终决定着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分界线。这些界限是武断的；然而一旦学到手，一旦内化以后，它们就被当作是实在的东西。” (Edward T. Hall 2010: 229—203)。“文化认同”涉及个体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所代表文化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20 世纪 70 年代，其研究伴随着西方“现代性及其引发的文化危机而出现” (丁琴海 2009: 51—57)。我国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陆续关注“文化认同”问题，郑晓云把文化认同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四个层次是“对异文化的认同” (郑晓云 1992: 4—49)。这与西方学者 M. J. Collier & M. Thomas (1988) 的观点相一致，他们从跨文化交际和文化的定义入手，借助系统理论的框架，聚焦交际双方的话语，以解释学视角探究两者之间的互动，认为文化认同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形成和管理的多重身份之一。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多重文化认同。有学者指出英语学习者更认同于目的语文化 (陈新仁 2008; 高一虹 2003, 2008)，汉语学习者语言学习过程伴随着文化认同变化 (魏岩军等 2015)，其复杂性有待进一步探究。

3. 研究方法

3.1 理论视角

布迪厄在文化资本理论中揭示了文化与资本之间的共同属性，指出文化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教育和学习劳动积累的成果。他认为文化通过精神生产的抽象劳动能够实现文化价值的转移，创造出新的价值，是一种非物质资本。根据布迪厄的观点，语言、文化、价值观、个性特征等精神产品都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本，与个体和生物特性相关的是具体化的文化资本，通过教育获取的能力、资格证书等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个人投入时间和精力，投入的时间长度可以简化为受教育时间长度，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转换过程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作为一种合法的能力能够为个体带来超常的价值，特定场域的主流群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语言、文化、价值观）占据支配地位，他们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和更高的社会权力地位，而其他群体的文化资本处于边缘地位，他们的话语权较小，社会权力地位较低（杨佳2021）。

国际中文教育场域内，学习者的母语语言文化背景、个性特征、中国语言文化能力和知识等作为不同形式的文化资本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中国旅居场域，汉语能力和中国文化知识作为场域内主流群体（中国人）的文化资本，在场域内占据支配性地位，是主流群体话语权和象征权力的象征，具有超常的价值。留学生的母语语言文化背景、个性特征等与他们的个体和生物特性密切相关，是一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在旅居场域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不同场域中的资本可以转换（布迪厄、华康德2004），留学生由母语场域带来的文化资本在旅居场域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如与有外语学习需求的中国人交换中国语言文化资本）实现价值转换。中国语言文化资本是留学生获取更多的旅居场域话语权和更高的旅居场域社会权力地位的重要工具，是他们的一种体制化文化资本。旅居场域内中国语言文化资本价值的凸显促使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积累，积累的过程中，留学生的母语语言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化之间形成竞争，个体主观能动性与不平等社会权力关系展开博弈。伴随着场域博弈，留学生的中国语言文化资本数量逐步增加，话语权和象征权力地位发生变化，出现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构、个人惯习的调整，惯习的调整过程就是他们认同重构、跨文化认同建构的过程。

3.2 研究参与者

“在人类学的抽样逻辑中，研究结果的效度不在于样本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样本的限定是否合适，……该样本是否可以比较完整地、相对准确地回答研究者的研究问题。”（陈向明 2000：104）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个案分析法，选取了一位有着较为丰富跨文化经历的喀麦隆留学生关树作为研究参与者。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对汉语、中国社会文化的态度非常积极，能够为本研究提供所需信息；二是他有参与本研究的较强意愿，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可行性。他说“世界在改变，所以我也要充值”（I-20201104），“充值”这个词体现了他对汉语资本的价值认同。他曾在美国、加拿大生活，自身的多元文化经历，让他对中国文化更容易认同，他生活在中国人社区，和中国人融洽相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生活，两个女儿都在中国学校上学，并且表现出了对中国社会的强烈融入愿望，非常符合本研究的需求。经征得其本人同意，本研究使用他的中文姓名。

3.3 资料收集和整理

本研究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实物收集法收集资料。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对关树开展了多次访谈，一直延续到 2021 年 2 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研究在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访谈之后，都是以微信聊天、书面答卷等方式进行非正式访谈，主要通过日常聊天的方式开始话题。通过非参与式观察对研究参与者日常生活、社交网络动态变化进行记录，收集有关图片和文字实物资料，作为研究的佐证。在对数据资料进行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的基础上，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对关树呈现出的语言、文化、族群、价值观等层面的跨文化认同进行了归纳。

表1 研究资料记录表

类型	编号	时长	语言	方式	日期
正式访谈	I-20191012	60 分钟	中英文	面对面	2019/10/12
非正式访谈	I-20200320	30 分钟	汉语	网络	2020/03/20
	I-20200402	30 分钟	汉语	网络	2020/04/02
	I-20200910	10 分钟	汉语	网络	2020/09/10
	I-20201104	20 分钟	汉语	网络	2020/11/04
	I-20201111	10 分钟	汉语	网络	2020/11/11
	I-20201231	10 分钟	汉语	网络	2020/12/31
	I-20210121	10 分钟	汉语	网络	2021/01/21
	I-20210219	10 分钟	汉语	网络	2021/02/19

4. 资料分析与结论

关税在旅居场域经历了个体主观能动性与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博弈，以及母语语言文化、英语语言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化之间的博弈，有过与定型观念、文化冲突、语言障碍的斗争。在博弈的过程中他选择了对中国语言文化资本的不断投入，采用积极融入的交际策略，调整个人惯习，出现了认知、情感、行为的变化，对中国语言文化从尊重理解，到积极学习、接纳、认可，乃至部分内化，逐步建构起了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4.1 中华文化认同建构

4.1.1 “媒体对中国的定型观念和负面形象并不是真实的”：认知变化

关税来中国之前主要通过媒体和在在中国的亲朋了解中国，获得的信息有正面的内容，比如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经济发展迅速、有良好的交流方式和发达的社会、非常好的教育等等。到中国之后，这些内容得到了确认，还了解和理解了许多新的东西，比如中国人口非常多、每分钟都有外国人跟中国人接触等。但他多次提到的“定型观念（stereotype）”反映出一些外媒对负面信息夸大其词对人产生的误导，与现实中国形成了一种博弈，通过亲历中国的生活，实情终占上风，他认识到“媒体对中国的定型观念和负面形象并不是真实的”（I-20191012）。

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网络、媒体更加发达，信息迅速传播，一条信息几秒钟内就能传遍全球。然而，信息的选择、加工、传播还是有很大的人为因素的，

视角不同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在新旧信息的博弈过程中，关树意识到“媒体在各个方面都被政治化了。因此，有关中国的某些信息非常刻板。如果你控制了媒体，你就能控制观众”（I-20201111）。来中国之前，他通过媒体和他人了解中国。“从媒体上看，中国人什么都吃，死的或活的。经常发牢骚，而且他们不停地抽烟。不太容易接受外来者。”（I-20201111）正如关树所说“媒体可以是教育人们的论坛，但也可以是传播虚假信息的场所。喀麦隆曾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这些国家的媒体影响很大”（I-20201111）。

中国虽然在迅速崛起，快速发展，但是仍然缺少话语权，掌握着话语权的西方世界，仍旧影响着全球大多数人的认知。关树的经历表明，认知是可以转变的，亲身经历是打破偏见的最好途径。认知是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认知上达到一定深度和广度，情感和行为才能随之发生改变，从而实现认同。

4.1.2 “中国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情感接纳

随着认知的深化，关树在情感上表现出了对中国语言文化、中国族群、中国价值观的接纳和认可。对汉语，他全力投入，在语言的使用范围和频率上逐渐向汉语倾斜，住到中国人社区，和中国人交朋友，用汉语交流，使用中文社交平台。汉语资本的积累，使他的自信心进一步增强，与初入中国时“适应困难重重……语言的障碍使文化冲击问题更严重”（I-20191012）不同，他“会一点儿汉语之后，没有太多的困难了”（I-20191012）。

经历过文化冲击的洗礼之后，他“觉得中国文化是今天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他“非常尊重中国文化，甚至觉得有许多值得他国学习的地方”（I-20191231）。他的微信个人标签“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M-20201231），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赞同与内化愿望。

他凭借着英语资本在旅居场域的交换价值，在汉语资本不足时，把英语作为“更常用的交流方式”（I-20191012）。中国语言文化资本得到一定积累之后，他积极用汉语与人交流，结交各种中国朋友，用中国人的方式生活，开始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族群。情感态度上的亲近和接纳，使他打破了对中国人和中国族群的“定型观念”，不仅更自然地融入了中国的旅居场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获得了成长。

亲历中国的疫情防控后，他对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有了更加积极的认可，

“政府照顾人民”“人民配合政府”（I-20210219），中国人的集体合作精神让他感叹不已，甚至认为在他所到过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一个让人民满意的国家”（I-20201104）。

4.1.3 “我甚至都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喝冷水了”：行为内化

关树个性开朗，英文流利，有多国旅居经历，这些都成为他的文化资本优势，使他更加容易接受异文化，也更容易被异文化所容纳。在中国旅居场域中，他抱着包容开放的心态，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资本优势，对不同于自己母语场域的规约和惯习加以尊重和理解，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过滤之后的模仿和部分内化，随着旅居生活的推进，他“更习惯做和吃中国饭菜。有时候穿中国唐装……常常随身带着保温瓶，习惯喝热水，甚至都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喝冷水了……感觉跟北京人聊天比跟外国人聊天舒服，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在广场跳舞”（I-20191012）。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他的行为举止不断地“中国化”，说汉语、吃中餐、跟中国人聊天，用汉语思维，对中国语言文化、中国族群、中国价值观从理解，到部分内化，逐步建构起了跨文化认同。

4.2 结论与讨论

旅居场域充满了各种博弈，来华留学生个体主观能动性与社会权力关系之间、母语语言文化与中国语言文化之间都在进行着斗争，促成文化冲击的出现，表现为到异文化环境后，由于失去自己所熟悉的社会文化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关世杰 2019：340—341）。关树初到中国，物理场域发生了转换，在新的场域中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由于行为各异，原有场域形塑的惯习非常不适应旅居场域的规约，原场域的文化资本在旅居场域中无法充分实现价值，心里难免会感到孤独和不习惯，受到文化冲击的影响。以上数据分析显示，关树在旅居场域的各种博弈中积极调动个体主观能动性，在冲突中进行协商与妥协，在差异中学习忍耐与包容，个体原初惯习在中国语言文化资本投入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和更新，建构起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其中，他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较高的跨文化敏感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助其积极应对外界的变化，进行中国语言文化资本积累，促进跨文化认同自我建构；具有交换价值的英语资本助其换取中国语言文化资本，推动其进行跨文化认同自我建构；外向的性格特征是促成其跨文化认同建构的另一

项具体化文化资本，具有快速融入旅居场域获取中国语言文化资本的超常价值。

4.2.1 较高跨文化敏感度的移情价值

Bennett 建立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MIS）显示，人的跨文化敏感度随着跨文化经历的增加而不断发展，没有任何跨文化经历的人处于民族中心主义的否定阶段，只认同自己民族的文化，对于其他文化是完全否定的。具有较多跨文化经历的人，会更具有跨文化敏感性。随着跨文化经历的积累，跨文化敏感度会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即民族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跨文化敏感度会随着跨文化经历的增加继续发展，对其他文化从接受到适应，最后实现整合，从而成为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人。关树较高的跨文化敏感度，作为他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在他的跨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显示了超常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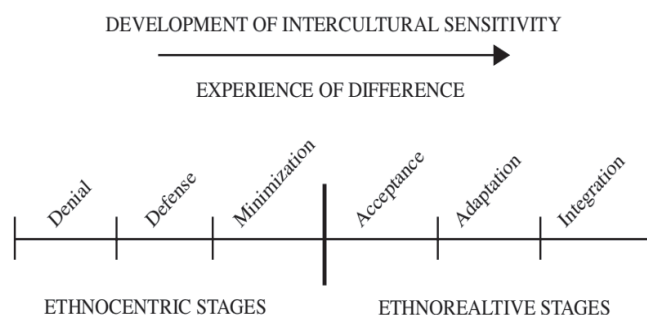


图1 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Bennett, M. & Bennett 2004: 153）

跨文化敏感度高的人更容易发生文化移情，他们努力通过一套结构而组织经验，这些结构更具有另一种文化的特征，而不是自己的文化特征（刘金花 2015）。关树的多元文化经历让他面对新场域的竞争时，能够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发生文化移情，客观地观察、分析，抱着理解、尊重、接纳的态度去对待中国语言文化、中国族群和中国价值观，从而在语言惯习、行为习惯、思维惯习上进行调整：学习汉语，积累语言资本；广交中国朋友，累积社会资本，努力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本；成为中国通，在场域竞争中获取有利的地位。他的跨文化敏感度已经达到了 DMIS 中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整合、发展的重点都是围绕着文化认同的，个体在旅居场域博弈中调动主观能动性，增加文化资本投入，提高

技能，调整惯习以进行积极的学习模仿，最终内化部分异文化元素成为自己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建构起跨文化的认同。

4.2.2 英语资本的交换价值

关树在英语殖民体系内获得的较为充足的英语资本，是他的另一种文化资本，在旅居场域中显示出了一定的交换价值，对他中国语言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凭借英语资本很快交到有语言文化交流需求的中国朋友，扩大了自己的社交范围，积累起旅居场域所需社会资本，从而更好地积累中国语言文化资本。中国语言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数量的增加，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中国语言文化、中国社会族群和中国价值观，使他在认知层面发生变化，情感层面发生倾斜，行为层面发生模仿和部分内化，从而建构起跨文化认同。

由于他对自己的投资有一定的预期，遇到困难时，他明确自己“到中国的目的”，暗示自己“必须跨越障碍”，“必须接受和适应中国”。在强烈的投资信心和决心之下，他的投资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回报：汉语水平不断提高，社交圈不断扩大，中国社会文化知识逐步丰富，话语权随之增加，这些都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促使他发生自我认同变化。中国语言文化资本的积累，帮助他获得了较为充足的旅居场域社会资本，家人、老师、朋友的支持，使他能够更好地整合中国语言文化元素，融入自己个人惯习中，成为自己的性情倾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更具魅力的多元文化人，从而助力自己的跨文化认同自我建构，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4.2.3 个性特征的融入价值

由于关树具有开朗外向的个性特征，对于异文化的开放包容态度，让他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社会族群、价值观能够采用融入的策略，既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认同，同时也接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在吸收和融合不同文化元素的基础上，逐步发生认同变化，建构起融合母语文化认同、英语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跨文化认同，在此，个性特征成为他的又一个文化资本优势。由于显著的黑人特征，他的“局外人”感觉较为强烈，完全融入较为保守的中国社会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他毫不气馁，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中国通”。他性格特征的融入价值在此充分显示，在无法完全融入的时候，他能够建构起“想象认同”，在一个对中国语言文化、中国社会族群、中国价值观充分理解和赞同的“中国通”的“想象共同体”中实现认同。想象认同作为跨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在他难

以实现现实中身份认同变化时，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投资目标，向跨文化认同建构靠近。

5. 余论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语言文化资本价值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于汉语和中国文化。大量来华留学生学成归国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在中国的所学、所见、所闻，已经成为他们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态度、政治态度、审美品位、行为模式已经融入了中国语言文化的元素，他们回国之后的正面宣传是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关键途径之一。来华留学生培养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到中国了解真实的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是提升中国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本研究中的关树来华前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媒体和亲朋好友。他多次提到现实的中国与他所看到听到的媒体的宣传很不一样，在西方媒体垄断话语权的当下，人们想要了解真相非常不易，“媒体非常强大，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能获得信息的论坛”（I-20201104）。因此，充分发挥中国旅居场域的正向引导作用，助力争取国际话语权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新冠疫情为来华留学生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国际中文教育打开了新的思路，对汉语学习者认同变化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基于群体层面研究的宏观思考，而是应该更多关注基于个体层面的微观调研，进而综合剖析，为有效的顶层设计提供实证依据。研究表明，留学生跨文化认同是个体与外部环境充分互动的产物，充分发挥场域优势，发掘他们的文化资本价值是助其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国际中文教育中，首先，应坚持中文教育的核心地位，以中文为媒介，帮助留学生更多接触中国社会文化，增强他们的获得感，深化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化资本的认知，促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其次，应充分调动留学生主观能动性，助其提高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理解力，建构起超越原有认同的多重文化认同，进而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最后，应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让来华留学生教育更好地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符合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规律和要求，减少留学生“局外人”焦虑感，提升他们的融入感。总之，国际中文教育对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要考虑国际教育特色，顾及留学生旅居者身

份,更要凸显中国特色,使他们在提高汉语理解力和表达力的同时理解、接纳中华文化,逐步实现中华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 爱德华·霍尔. 2010.《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 陈默. 2020. 认同对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23-35.
- 陈向明. 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陈新仁. 2008.《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戴晓东. 2011.《跨文化交际理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丁琴海. 2009.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第2期: 51-57.
- 高一虹、周燕. 2008. 英语学习与学习者的认同发展——五所高校基础阶段跟踪研究.《外语教学》第6期: 51-55.
- 高一虹. 2001.《“1+1 > 2”外语学习模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关世杰. 2019.《跨文化交流学(第10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金花. 2015. 英语教育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文化认同实证研究.《英语研究》第2期: 130-137.
-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2004.《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芮晓松、高一虹. 2008. “二语”投资概念述评.《现代外语》第1期: 90-98.
- 申莉. 2021. 优化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促进中华文化认同.《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第10期: 1-3.
- 魏岩军、王建勤、朱雯静. 2015. 不同文化背景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研究.《华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38-47.
- 魏岩军、王建勤、朱雯静. 2015. 影响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的个体及社会心理因素.《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107-115.
- 杨佳. 2021.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二语学习者认同研究及启示.《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40-147.
- 张春兴. 1992.《张氏心理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郑晓云. 1992.《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Bennett, M. & Bennett, J. 2004.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global and domestic diversity. In D. Landis, J. Bennett & M. Bennett, (Eds). *Th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153-156.
- Dornyei, Z. 2005.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 Freud, S. 1924.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 10: 434-436.

Gardner, R. C. 1985.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Lambert, W. E. 1974. Culture and language as factors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Aboud, F. E. & R. D. Meade (eds.). *Cultural Factors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Bellingham: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 91–122.

Norton, B. & F. Kamal. 200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a Pakistani school.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2(4): 301–317.

Norton, P. B. 1995. Social identity, invest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1: 241–249.

Schuman, J. 1986. Research o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Development*, 5: 379–392.